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如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诗词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华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转化为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

汪建新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要有精神，它是国本；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它是脊梁。什么是中国精神？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国精神的本质内涵：“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中国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诗词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华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转化为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毛泽东诗词字里行间所洋溢的中国精神，扣人心弦、催人奋进。

深厚的爱国情怀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支撑他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当属蓄积于胸中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毛泽东诗词在文化取向上凸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维护尊严、追求独立、寻求解放、谋求幸福伟大历程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诗词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优秀传统，又赋予了具有时代意味的精神内涵。在毛泽东吟咏祖国河山的诗作中，这种爱国

情怀表现得既直接又生动。“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他既乐山又乐水。毛泽东笔下的山，仪态万千、瑰伟雄奇。会昌山“颠连直接东溟”，昆仑山“横空出世”，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泽东笔下的水，神奇曼妙、变幻无穷。他沉醉于“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清纯与活力，震撼于“大河上下、顿时滔滔”的静穆与凝重。他欣赏“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自然雅趣，赞美“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烟波浩渺，向往“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气壮山河的诗句，使人对伟大祖国油然而生敬意，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深感自豪。

深沉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饱经沧桑，自古就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不朽精神。近代以后，西方列强入侵，封建统治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地主重重压迫”“遍地哀鸿满城血”“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始终忧虑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忧患意识是毛泽东奋斗精神的不竭动力。

少年毛泽东读过《支那瓜分之命运》一书，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

将亡矣！”使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毛泽东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1915年他的同窗易昌陶不幸病逝，毛泽东为他写一副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潮，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毛泽东借悼亡以消心中块垒，强烈地抒发了一个热血男儿忧国忧民之志。1925年，“独立寒秋”中的毛泽东，置身于充满生机的山川，再反观军阀割据、危机四伏、民生多艰，忧患意识促使他从内心深处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流露出其将人生追求同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英雄使命与宏大抱负。1927年春，中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毛泽东吟成苍凉沉郁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苍凉心情。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在关乎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写下《清平乐·会昌》，表达了他内心的抑郁和焦虑。正如他后来解释诗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时所说：“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1935年2月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第一首作品。遵义会议扭转了毛泽东个人的人生境遇，但这首作品却显得极其苍凉凝重，因为他深知“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执着的革命精神

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激发了毛泽东昂扬的报国之心。

在1919年7月《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到了近代，“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此“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面对“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社会现实，他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决心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918年4月，新民学会创办时，其目的在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和风俗”。1921年初，毛泽东将其变成“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宗旨，也成为毛泽东的毕生追求。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毛泽东一生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不断从一个“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热血青年，变成“唤起工农千百万”“霹雳一声暴动”“横扫千军如卷席”“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成就了千秋伟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由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一伟大实践也催生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博大的天下胸怀

《礼记·孔子闲居》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具有谋划大局、创造大局、驾驭大局的过人胆略。毛泽东诗词给人的印象总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不管是写自然景观，写动物姿态，还是写社会实践，都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宏大气魄和阳刚之气。在《沁园春·雪》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

河上下，寥寥数语，就把幅员辽阔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几个人物，就把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娓娓道来。

毛泽东从不沉湎于纯粹个人的爱恨情仇去寻求创作灵感，而是始终以一个旧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创造者的姿态审视和观照一切。毛泽东不少诗句中带有“我”字，如“春来我不先开口”“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里“我”是指他本人。但在很多诗句当中，如“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我失骄杨君失柳”，“我”不光是作者本人，“我”既是个体，也是群体。而在“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诗句中，“小我”已融入到革命洪流的“大我”之中。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升华为小我与大我，有我与无我合二为一的全新境界。

《念奴娇·昆仑》中，毛泽东倚天抽剑，要把昆仑山劈成三截，原先是“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后来毛泽东说：“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错误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不仅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关注全人类的前途。他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使革命精神浸透了深厚的民族底蕴，又使民族精神充满了博大的世界情怀。

积极乐观的心态

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是敌强我弱，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从不悲观、从不气馁。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这样描述必将到来的革命胜利：“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

书法首要是把字写好

孔达达

传统书法的根本是要把字写好，虽然评论家习惯于把人品、学问和见识与书法的优劣联系在一起，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写字首先是一种技术活。任何技艺都是有标准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技艺的标准可能并不相同，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是有一种标准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而这种主流标准的传承即是传统。

因此要想把字写好，首先需要把书法的标准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树立正确的品评观。只有知道什么是好字，才有可能把字写好。虽然，有评论家对素人书家或童叟写字时不经意中流露出的天真情趣大加赞赏，但是这种赞赏更多是出于一种猎奇心理，是一种情感上的短暂愉悦。过于推崇未经训练而偶然出现的笔墨情趣，很容易造成江湖书法和丑书泛滥的流弊。

书法艺术中所追求的平淡天真，是一种返璞归真，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回到看山是山的境界，这是在熟练地掌握书写技术后，所达到的一种得心应手、随心所欲的状态，与一些人所理解的抛弃传统的个性化书写方式并不相同。

与西方艺术教育所强调的培养创新能力不同，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首先是建立在对经典模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教育理念中学习即是模仿，由此也形成了一整套摹、临、仿的学习方法。

书法的临摹有临帖和临碑两种，临帖的对象是历代所流传下来的名家书迹，名家的原迹通过各种复制方式印成字帖，供书家临摹，临帖是传统学习书法的基本方法。还有一些古代字迹被刻成碑文，之后被转印成拓片，清代金石学的兴起，带动了书法的碑学传统，由于前代所留下的大量碑文并非名家所写，因此清代乾嘉之际开创的碑学传统，打破了传统的名家经典理念，由刻石所产生的金石味也成为书法的审美标准之一。

碑学在康有为的推动下曾达到高峰，然而一味地追求学碑则容易养成笔法不全，书体单一的弊病，但是，只是临帖则容易造成笔力薄弱的媚俗之态。学习书法应当以学帖为主，通过学帖掌握全面的书体的书写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碑以加强笔墨的刚劲和醇厚。为了全面掌握笔法的技巧，一个好的书家往往都经过临帖和临碑两个阶段。

通过对古代经典反复模仿，手臂的肌肉逐渐适应了毛笔的书写方法。经过经年累月的训练，书家往往能够总结出一套自己的临帖或临碑的经验，每个人的身体结构和运气方法不同，这种经验也往往各异。个人风格通常也是在这种反复的磨练和追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现代书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艺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标准所造成的冲击，致使很多人开始以西方艺术中所推崇的实验性和创新精神为尊。书法作为中国最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有些书者在基本功尚不扎实的情况下，便刻意追求超越传统的书写方式，梦想创立个人风格。这种思路并不可取。

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有适合于它的工具和创作方法，工具的使用方法是很多人的长期经验积累而成的，而书写方法也是书家在创作实践中吸收了观者的不断反馈后形成的，是集体的努力的结果，不应轻易被否定。这些方法流传至今并被采纳，自然有它的原因和逻辑所在。对于书法这种对于章法要求很高的艺术来说，正确使用工具和掌握其艺术法则尤为重要。

同很多其他的艺术方式类似，书家写字的最高境界便是创立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模仿得像自然不是艺术创作的目的。然而，如果连基本的笔法和结字都没有掌握好，就妄谈创作，那么即使形式再新颖，恐怕也不能算是好的书法作品，或许也只能列



《陋室铭》孔达达/书

入实验艺术的范畴里了。

在熟练掌握技法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必不可少。中国的文字从表象的符号开始，发展成为表意的文本，蕴涵了文化的内在意义，这种文化的含义包含在书法的形式之中。中国艺术所强调的“技”“艺”和“道”的融合同样体现在书法的创作中，而创新是建立在对“技”的熟练掌握的基础之上的再创作。



我建议 you 从北桥湾南口出发，往北，先经过北桥湾那一段不长的小街，相信你能体会到一种老北京民俗生活的气氛就在身边环绕。彼此招呼着的中学生，把自行车骑得溜熟，屁股离开车座老高，为的是脚下使出更大的劲儿；上了年纪的老人缓缓地走在路边，手里握着刚刚买好的鲜菜；对摇晃着鸟笼子的中年汉子，你最好稍稍让一让——他们把鸟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不远，就有一个丁字街展现在你面前，何去何从，任你挑选：顺势向左一拐，是南芦草园；接着往北走，到顶头，是个不规则的三叉口，往西斜着的胡同，是北芦草园，西头通往长巷头条到长巷四条，里面有不少民国时留下的商贾旧迹和旅店；东边则是薛家湾，进薛家湾不远往北，通往草厂，这草厂一共有十条胡同，从草厂头条到草厂十条，排列得很整齐，全是老民居，够你逛一阵子的。

甬管走哪条胡同，你都会发现，这一带很少有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走向的街巷——这正是当年的河道的证明。

北京的南城，形成于明代。明成祖委派刘伯温在元大都基础上建城，将整个北京城南移，其南线沿着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筑城墙，城墙以南就算城外了，人们熟悉的大栅栏、前门大街、鲜鱼口，在那时还是旷野荒郊。明正统年间，也就是那位后来兵败土木堡而成为瓦剌俘虏的明英宗统治天下的时候，因修城壕，作坝蓄水，恐雨水多溢，在正阳门东南低洼处掘口泄水，形成流往南桥湾方向的三里河。而这一地区，彼时大略河又交错，并非“一条大河波浪宽”，后来随着前门外的逐渐繁荣，这一带百姓顺河又走向筑屋建房，形成今天这么多弯斜的胡同。无论是元代还是明代，胡同街巷都是有一定设计的，甚至宽度都有规定，不可随意乱来。但三里河形成民居胡同时，已是按其自然状态建构了。

这几条胡同里有不少好房子。街是斜斜的，弧形，走到“十间楼”的时候，你会感觉地势高了起来——那正是河边高岗儿的痕迹。在这些胡同里，你常能发现一些古旧门联，譬如“忠厚培元气，诗书发异香”“高才食旧德，流藻垂华芬”等等，北京“八大祥”之一的谦祥益绸缎庄老掌柜的家也在这一带，他家的门联“经营昭世界，事业宸寰

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这是何等的豪迈！又是何等的乐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毛泽东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中的残句，他后来曾多次提到这句诗，用以表达自己的乐观和坚定。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面对艰难困苦，毛泽东傲视万物，雄视寰宇。“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各种挑战，毛泽东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沉稳持重。“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直指武夷山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乐观心态和必胜信念激发出无穷力量，使毛泽东坚定执着、勇往直前。毛泽东的自信绝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历史潮流的深刻把握与积极响应，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和精确判断，源于他对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和坚决维护，源于他对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他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深刻地激励着我们。

当毛泽东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改革与创新便成为他奋斗人生的主旋律。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业，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诗词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宏伟史诗，而毛泽东诗词本身也是改革创新的直接产物。

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解，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件有新视角，是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与现代生活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奇葩。



芦草园与草场

——三里河的前世今生（四）

□ 赵润田

球”显得气魄不凡。

这一带的胡同，以南北芦草园、草场一至十条所占的地盘最大，它们是怎么得名的呢？原来，元代时候，大都的城墙都是土垒的，外面并不砌砖，为了防雨，每年都需要在顶上覆盖芦草，芦草园一带就是那时存放芦草的场地。那时，北京还没有内外城之分，自丽正门以南，就是一片旷野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南四环甚至五环以外的光景。

现在，新挖凌的三里河两岸也植有片片芦苇，还未长起，仅有尺把高，也许是作为向古时旧地的致敬吧。

草场一至十条、长巷一至四条，以及兴隆街两侧鱼骨一样展开的胡同，大体都呈南北走向，路边的院子则是东西向设门，这与北城四合院南向设门大异其趣，成为一种变体的四合院，另是一番风景。

